

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謝灼华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誕生前的二个月，在中国革命搖籃——上海，出現了一个“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書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它揭开了中国現代进步图书馆事业史的序幕，和前期李大釗、毛泽东同志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起，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午台上，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团结广大革命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强的斗争力量。它的光輝照亮了現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五四运动前就开始了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識分子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也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內）从封建、保守、反动的旧文化束縛中解放出来。他們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在科学和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探索和学习，大量翻譯西方科学著作，并从事著述、发表文章，使五四运动前思想界、文化界有了一番新的变化。而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文化，“由于中国政治生力軍即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午台，这个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摆开了自己的陣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化革命就更深入、广泛而且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0頁，1952年，人民出版社）这时，文化战线上两种文化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资产阶级以及封建文化遺孽的斗争极其激烈，社会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通过一切文化事业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主张，他們办起了大量的报纸、期刊，多种多样的文化机构。書籍、新聞、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自然促进了这时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界的斗争，反映在一方面是中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釗同志、中国人民的伟大領袖毛泽东同志都从事于图书馆工作，利用图书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广大青年，促使他們

觉悟起来。另外一方面是封建文人梁启超、帝国主义文化代理人胡适之流也紧紧抓住图书馆——这个“教化民众之場所”，以扩大其反动文化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中国現代图书馆事业史早期阶段两軍对垒的局面。

上海通信图书馆正是在这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党的革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对五四以后新思潮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培养了不少坚强的领导骨干。

我們决沒有忘想去哀求强者的布施，替我們在各地造起图书馆，也决不甘心只期待現社会制度崩坏后的总解决，而在未崩坏之前不去夺回讀者的自由；——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讀書自由 1926年

一九二一年五月，进步青年，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应修人同志，团结了上海錢业界的一些职员和学徒，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这个仅由10个人创办起来，只有138种不滿三百冊藏書的小图书馆，第一次承担了上海市唯一的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开始了它的革命活动。

最初，他們是以“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的名字出現的。他們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可以从创办宣言中看出来：“近来改造社会家多肯着眼于出版事业，这原是最可喜慰的事，但于讀者的一方面却很少有人顧慮。試問在現代私产制度下的人們，能有充分的讀書時間么？能有充足的买書力么？……沒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則書报只能流通于有产阶级。”这是对那黑暗社会的控制書，对那底层讀者的亲切关怀的表征。因此，他們靠自己买，少数外界的捐贈，抱着“多認識几个有志的讀書者，多添我們几分激动；多貸出几种有益的書报，便多添我們几分快慰。”赤心献胆为讀者，历尽艰辛的办起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他們的希望，一是在于使图书馆“成为接近人們底藏書庫”，一是“为大規模的上海图书馆的先导”。总之，以实现新文化以教育人民大众为目的。

“革命工作者为讀者服务的目的是如此高超：‘咱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使爱讀者者有得書讀，努力使不十分爱讀者者变成十分爱讀，努力使不爱讀者者变成一分一分爱讀，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咱们义不容辞的，并且这些工作也不是枝节的，也不是与革命絕不生关联的。’”

正因为革命者了解了圖書館工作“也不是与革命絕不生关联的”，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广大下层人民服务，就成了上海通信圖書館的创办宗旨，而通过圖書流通，传播新思想，以新文化思想影响于广大青年，使他們在“有时代思想的各学术文艺書报”中找到真理，找到打碎旧制度、旧社会阶级压迫的力量源泉，达到团结民众，一起推翻旧社会的目的，这就是他們创办圖書館的崇高目的。

因此，上海通信圖書館向亲爱的讀者招手：“我們的讀者！你以及你的家人朋友之間，有买不起好書或者买不遍好書的苦悶者嗎？——請到我們这里来！我們这里排列着各种学术、文艺的好書，完全讓你自由选择，讓你到处借讀。有过不慣現社会的奴役生活，有受不到一滴人类的愛，因而成为生之詛咒者嗎？你們向这里来！这儿充满着同情的欢笑，人生的乐趣，这儿的組織是‘艺术化’替代着‘商品化’，这儿的信仰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替代着‘你搶他夺，人死我活’！”

上海通信圖書館就是这样在那丑恶的旧世界中帮助讀者得到“难得的樂趣”和革命的知識。

收集并流通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术文艺的書报，使每人……能随时随地讀到无数的刊物。

——上海通信圖書共進會章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論人民民主專政”，社会主义教育課程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第97頁，1957年，人民出版社）中国先进知識分子，在欢呼和向往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們多么迫切需要大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啊！而上海通信圖書館正是以收集进步圖書为己任，大量收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書籍、报刊，流通馬克思列宁主义書籍、报刊和新文化进步書籍，非常鮮明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圖書館的阶级特性。

上海通信圖書館館藏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从我們所接触的材料中，关于馬克思学說的进步書籍就有馬克思著“哥达綱領批判”（李春蕃譯）、“列宁特

号”、“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社）、“社会主义总論”、“社会主义浅說”、“科学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馬克思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書籍：有“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軍組織大綱”、瞿秋白著“二七劳工流血案念”、“五卅烈士事略”（小說月报社），以及革命和进步刊物“新青年”、“响导”、“政治周报”、“中国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之一，1923年）等。上海通信圖書館尤以革命文学、进步文化書籍藏書著称，如魯迅先生的著作、郭沫若先生的著作、茅盾先生的著作等。

不讓任何地方的人們讀不到任何种类的好書，不讓任何种类的好書流通不到任何遠远的地方，这是我們特用通信借还制的本意。

——上海通信圖書館与讀書自由 1926年

上海通信圖書館是用通信方法借还圖書的，这样不仅使上海一地讀者能得到借閱圖書的机会，就是国内远近各地的讀者也可以通过書信借到圖書。按照他們的本意，这种方法有二种好处：一是无论职业貴賤，只要能够出郵資，便有書看。这种便利讀者的办法，无疑是对二十世紀初期圖書館講求門戶森严，讀者入館要办諸多手續，以及用“鋪保”、“保証金”、“押金”等制度限制讀者入館的一种有力的对抗和无情的諷刺；另一种好处，即是使很多沒有建立圖書館的地区讀者，可以通过書信借到圖書。因此，他們是“以无猜忌的真情接待借書者，不收租費，不設保証，也不希望任何的酬勞，以設身处地的用心为借書者着想，使不受路途限制，不受經濟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時間的限制”。

通信圖書館怎样及时的介紹館藏圖書給讀者，是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上海通信圖書館最初的办法是把所有圖書（包括新書、报刊）随时編成書目，在書目上附印各种規章，讀者根据这些規章，选择所需圖書，用書信借出。但書目往往几个月才出一期，新書甚至有买了一年后才见于書目的，这对借書者是不十分便利的。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他們创办了“上海通信圖書館月报”。目的正是想通过月报，报导新書，指導讀者閱讀，反映讀者意見，密切圖書館与讀者的关系，以及定期向本館讀者汇报工作。借書者必须先作为“上海通信圖書館月报”的定戶、才能借閱圖書館圖書，实际上也只有作为“月报”的定戶，才可以借到圖書，因为本市或

外地讀者，要想借閱圖書，只有通过“月報”中刊載的書目，查考其藏書動態，了解其借書規則，才能借到所需的圖書。所以“編印月報的最大的意義，是使借書者與圖書館之間有條具體的、息息相通的橋樑”。

讀者從書目中可以知道，要借什麼樣的書籍必須用掛號函件投寄。而一般書籍，只要平信投寄就可以了。在書目中註明“停寄”字樣的，即是圖書館已借出或提存了的書籍。讀者憑此書目報導來借閱圖書，一般是不会落空的。其借書方法也很簡單：讀者先了解借書規定，按借書規章填借書約（借書條）。空白借書約在每月月報中附贈。圖書館接到讀者借書約後，即辦理圖書登記，包裝好，并夾贈空白借書約和還書包裝紙，寄給讀者。所以讀者借還圖書並不感到麻煩，因為圖書館的同志們已把困難留給自己，方便給了讀者。上海通信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也是獨特的，如最初把圖書分為二十八類，如“社”（社會科學）、“哲”（哲學）、“倫”（倫理學）、“心”（心理學）……。這樣的类目名稱，較適合於圖書流通和幫助讀者了解其內容。而圖書分類法的“類”是適應藏書需要、科學發展而經常增減的。一九二六年八月又採用了新的圖書分類法。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圖書館的革命者們如何講求讀者方便而發揮大胆創造的精神。

上海通信圖書館通過“月報”進行了很多推薦圖書、輔導閱讀的工作。如“月報”中有“新書報告”、“新書介紹”、“最近之出版界”、“本月份新書目”、“新書摘要”等欄，這些都是推薦新書的圖書宣傳工作。如一九二八年九月就曾經刊載潘梓年著“蘇俄新教育”、蔣光慈著“俄羅斯文學”等書的內容摘要。為了推動讀者學習，圖書館還發起過“愛讀書籍”運動，這實際上就是現在採購工作中的所謂群眾路線的方法。叫讀者把愛好的書籍推薦給圖書館，圖書館則借此了解讀者的需要，滿足讀者的要求。

蓬勃的發展與巨大的影響，正如一把火炬照亮了青年前進的道路。

上海通信圖書館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圖書館有黨員負責工作，也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以廣大革命青年作為群眾基礎，展開了和敵人的各種鬥爭活動。雖然它是處於那樣艱難和複雜的環境中，但是任何反動派都很难撲滅這火種。它的發展和影響，遠遠地超過了任何反動的圖書館。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過，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上海

通信圖書館成立時，創辦人只不過10個，圖書也只有138種281本。那時，這小小的圖書館，在社會上的名氣是微乎其微的，但正如任何革命事業一樣，都由萌芽而壯大，上海通信圖書館也是經歷過這段過程的。至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時，它已成為國內極有聲望和影響的圖書館了。一九二三年，藏書總數增至598種，一九二五年三月增至1,106種，一九二六年七月增至1,825種2,342部，期刊合訂本56種320部，期刊散訂本62種923部。一九二八年，經過七年努力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基本會員增至450人，讀者增至5,000多人，圖書增至五千多種，在國內圖書館界起着巨大的作用。

圖書館的圖書借出數也是逐年俱增的，如一九二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共借出書籍1,663種，每月平均借出230多種。但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份就增至448種，一九二五年八月662種，十二月達755種。借書者遍及全國二十省區、各大城市、鄉村，更及於南洋群島、日本、美國、法蘭西等海外各地。

上海通信圖書館對讀者的巨大影響，我們可以從讀者的反映中看出來。一個署名“豫”的讀者是這樣寫的：“上通圖共進會（上海通信圖書館共進會的簡稱——引者）是我們國家社會極有利益的團體，全國勞苦的青年思想上、智識上受她的幫助實在極大，即就我個人而論，雖和她相識僅半年之久，但從她得到的恩惠利益，已經是不可計算的了。”“你們（指上海通信圖書館的工作同志們——引者）大無我的精神，利他的熱忱，我真佩服，真景仰。不料在此拜金的社会里，竟使我充分的嘗到了人類真切篤摯的愛，實在是我夢想不到的事了！”從這些反映中，我們就可看到讀者是如何愛戴這個教育和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覺悟，走上革命道路的圖書館了。

我們從所接觸的一些資料中，也可以看到，革命先鋒和現代革命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都在上海通信圖書館里做過事，實際從事過該圖書館的各項工作。在那裡，他們受到了革命書籍的教育，接受了革命鬥爭的鍛鍊，走上了為謀求人類解放的道路。如譚代英同志就曾擔任過該館共進會執行委員的監察委員。又中共黨員應修人同志從圖書館成立起就具體負責圖書館工作達六年之久。再如郭沫若、錢俊瑞、叶紹鈞等同志均在該館做過事或是一個忠實的讀者。而已故的作家鄭振鐸、郁達夫……也是當時通信圖書館的支持者和讀者。

火花迸发的动播的革命的大时代，这大时代的浪潮中，卷去了我们好多同志，……

——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 1928 年

大革命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中国社会，革命者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斗争中，高举着红旗奋勇地前进。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面对这一伟大的斗争，积极的投入了革命的行列。一九二八年九月，“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的扉语中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大革命风暴：“在去年三月国民革命军进展到上海，这是个火花迸发的动播的革命的的大时代，这大时代的浪潮中卷去了我们好多同志。同时，我们的‘通图’也不得不停顿下来，六月间，虽然有少许同志为它奔走，但是为革命所疲惫麻木陷于绝望衰颓的消沉啊！叫喊终于成为空响了。”这时，国民党当局早已蓄谋封闭它。先借接受、救济图书馆为名，以达到扼杀这革命图书馆的目的（给每所图书馆六十元经费，而买书费只及二十分之一，这数字的可伶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的卑鄙行为，只能引起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及广大读者的极大愤怒，留在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积极奔走，团结读者，终于又把上海通信图书馆“复活”了。当然，这时的借书者仅及百余人，但不久仍然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累计借书数又由 115 种 115 部激增至 674 种 3,083 部。它仍然在上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国民党见“接受”“救济”无效，就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摆出了屠杀者的面孔，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开出面，伪上海市教育局、公安局配合军警特务查封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当时扣去图书馆执行委员二人，值夜委员二人，把全部图书、设备以至图书馆图章都没收了。

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革命的火花也永远不会熄灭的。党有计划的把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转入地下，而在一九三三年又在上海创办了“蚂蚁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继承了“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在新文化战线上仍然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后，把馆藏图书严格地审查了几个月，剩下几千册图书并补充了大批反动、黄色的书刊，安排了国民党特务，办起了“上海市流通图书馆”，想以反动思想来麻醉和欺骗人民。但这个图书馆的读者寥寥无几，而其读

者成分也是可想而知的。鲁迅先生曾经描写过这时的中国文艺界，谓：“……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驱使的自己的伙。但这立即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象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欢去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鲁迅选集，下卷，第153页，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用这段话来形容国民党衙门——上海市流通图书馆，真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革命先驱者的鲜血，洒满了中国革命的漫长道路上。他们的工作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了辉煌的基础，他们坚决依靠党的领导，紧密配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喊出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图书馆的党性原则，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光辉传统，是我们永远应该继承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同志们，历尽艰苦，和反动派作不调和的斗争，在各方面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为广大读者准备精神粮食，这种一切为了读者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他们不断地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对读者进行高质量的辅导，通过图书使读者真正受到革命教育的效果，以及依靠群众、在群众中生根、在群众中发展、一刻不离开群众的工作方法，一样是值得我们今天图书馆工作者好好学习并加以发扬的。

纪念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先烈们与先行者，正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也是为了给今天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创造出更大更好的成绩。

作者附言：这是为了缅怀革命图书馆工作者而写的一篇资料性文章，感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其中可能有与事实不符者，望读者多多指正。写这篇文章时用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应修人、潘漠华选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的几篇文章。

（转载自“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2期，全文略有删改——本刊编者）